

## 红色脊梁

## 王近山：逢敌亮剑 身先士卒

雷从俊

电视剧《亮剑》虽播放有年，剧中“李云龙”的艺术形象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剧中，讨论作战事宜时，他关于“亮剑”精神的发言豪气干云：“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决不含糊！”

开国中将王近山，正是“李云龙”的艺术原型之一。

“其实，父亲王近山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一直是‘亮剑’精神的践行者。抗日战争时期，在韩略村伏击战中，他以上率下，猛打猛冲，指挥部队取得重大胜利。战后总结时他强调，指挥员要敢于‘亮剑’。”王近山之女王媛媛的话，把我们的思绪引入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

1943年10月，时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的王近山，接到命令：率部火速奔赴延安，执行护送干部、扩编部队及保卫陕甘宁边区与党中央的重任。王近山即率该旅16团赴命。

途经山西洪洞县韩略村附近时，他们发现一支日军精锐部队迎面而来；侦察敌情之际，又获悉不远处我军一部遭日军围困。王近山认为，如果伏击这股敌人，既可吃掉这块“肥肉”，又可为我军解困。大敌当前，来不及请示，王近山当即下达战斗命令。他一边巧妙部署兵力，一边组织群众支援配合。我军依托有利地形巧妙设伏，迅猛突袭。

战斗持续约3个小时，歼敌军官120多名，含1名少将旅团长、6名联队长，而我军伤亡轻微。战后才知道，这股敌人是由日军中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他们在韩略村刚一露头，就被八路军消灭。战后，王近山在干部会议上进行战斗总结。他说：“合格的指挥员，既要闻令而动，又要主动寻机、敢于亮剑！战争之道，贵在‘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

编者按：

在位于周口市西华县的黄泛区农场场部旧址，王近山将军旧居静静伫立，一砖一瓦似乎都在讲述着将军解甲归田、专事林果的故事。1964年8月，王近山被任命为农场副场长，分管园艺工作，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与果品销售。逆境中，他始终初心不改、坚毅乐观，任职5年间，与广大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干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生动典范。农场的春耘秋收，褪去了战场的炮火硝烟，甚至让许多人忽略了他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战绩与赫赫成名。从周口走出的军旅作家雷从俊，很早就了解王近山将军的过往，对“一代战将”素怀敬意。近日，他通过披阅史料和深入采访，为我们勾勒了王近山将军那迥异于农场形象的战场风采。

备’。”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指挥员要敢于亮剑”。

“父亲到达延安后，想到未经请示就主动发起伏击战，他做好了接受批评甚至处分的准备。他正要写检查，没想到却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王媛媛说。

韩略村战斗的胜利意义重大，被《解放日报》誉为“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典范”。王近山率部抵达延安后征尘未洗，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称赞：“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王疯子’，如今已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了不起呀！这次韩略村伏击战就说明你很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个漂亮仗！”

“王疯子”的绰号由来已久。王近山15岁加入红军，在入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他和战友陷入敌人包围。他提刀挎枪勇猛冲锋，子弹打光了便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死死抱住敌人一同滚下山崖。敌人被摔死了，王近山也多处“挂花”，身负重伤，险些牺牲……王近山那股不要命的劲头令人印象深刻，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王疯子”。长征时期，王近山在一次战役战斗中，作为基层指挥员屡次冲锋在前，“王疯子”更是声名远扬。

“在延安那次接见中，毛泽东同志勉励我父亲‘你还年轻，前途远大，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掌握更多的革命理论，这样将来才能指挥更大的胜仗’。”王媛媛说。

后来，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首长的精心培养下，当年的“王疯子”不仅保持了身先士卒、勇猛顽强的品格，也在不断学习中提高了文化知识修养、增强了军事理论底蕴，逐步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

抗日战争中，王近山率部参与了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七亘村战斗、韩略村战斗、冷台山战斗及著名的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与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襄樊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战斗。这些战役战斗中，“王疯子”将敢打敢冲、以上率下、身先士卒的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身教胜于言教。王近山职务越来越高，但敢于亮剑、冲锋在前的作风从来没有变。他的过硬作风和战斗精神，感召带动着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大

家都说，“王疯子”带的兵，跟他一样勇猛。

1946年9月，在定陶战役的大杨湖战斗中，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的王近山，面对国民党部队6倍于我的兵力，挺身而出，主动请缨。他按照上级部署，利用有利地势，率部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拿下大杨湖，生擒国民党中将师长赵锡田。战斗中，王近山将指挥所设在距敌人仅300米的地方，随着战况推进，持续前移，从旅、团指挥所一路深入尖刀营。有人说，“以行动代命令”是王近山带兵打仗的精髓。而身先士卒的行动，对于指挥员而言可谓“亮剑”精神的生动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近山奉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率部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进行殊死较量。上甘岭战役中，王近山将指挥部设在阵地附近，用望远镜抵近观察，不仅把命令下达到军部，还常常指挥到师、团，甚至直接指导连、排、班作战。在惨烈胶着的战斗中，作为一线指挥员的王近山有时几夜不眠不休，战场的每条消息、每个细微动向，都牵动着他的神经。在43天的鏖战中，他和战友们以鲜血与生命“熬”出了殊为难得的胜利，打赢了这场重要的防御战。敌人领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顽强，也领教了“王疯子”的厉害。

“今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将近半个世纪了……”王媛媛说。硝烟虽已散去，战争却从未走远。回望王近山将军的战斗历程，他传奇的战斗经历、敢于“亮剑”的血性胆气，他靠前指挥的身影、以上率下的作风，都给人以启示，激励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续写新的荣光。

（原载2025年12月8日《解放军报》）

## 周口作家

## 一个和八个

任动

才华卓绝的战士诗人郭小川1957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歌作品之一。1984年，张军钊将这部长诗搬上银幕，同名电影《一个和八个》成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我们这里要谈的“一个和八个”，是一个小镇和八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个小镇指的是周口市淮阳区的新站镇。新站镇地处淮阳、项城、商水交界，南邻沙颍河航道，1996年被河南省建设厅命名为“中州名镇”。新站镇自明朝建镇至今已600多年，文化厚重，人杰地灵，文脉昌盛，作家辈出，目前已经走出了李鑫、马泰泉、孙方友、墨白、柳岸、李乃庆、孙青瑜、红鸟等八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种现象在中国是极为少见的，因而非常值得关注。

出身新站镇的作家，喜欢把自己的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新站镇作为作品的背景或者人物的舞台，并将之艺术化地命名为“颍河镇”。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颍河镇”往往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地点，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交汇地”（张闽语）。

墨白把很多小说的背景都放在了以故乡新站镇为原型的“颍河镇”。墨白小说中的“颍河镇”，具有强烈的地理学意义，他曾在《红房间》《黑房间》《航行与梦想》《幽玄之门》《远道而来》《瞬间真实》《同胞》等不少小说中为读者描述“颍河镇”的格局，甚至在中篇小说《黑房间》里，为读者画了一幅关于“颍河镇”的方位图，以此来强调“颍河镇”的“非虚构”色彩。同时，墨白笔下的“颍河镇”，作为形而上意义上的关于人类生存和精神的“隐喻场”，又是一个被赋予丰富象征意味的艺术空间而被作者反复强调。就如墨白所说：“颍河镇对于外部的世界来说是闭塞的，可同人类之于宇宙是相同的，颍河镇应该是人类的一个缩影。所以说，这个小镇太丰富了，丰富得就像一个海洋。”

毋庸置疑，墨白笔下的“颍河镇”，已经成为内在张力感十足的意象和符号，甚至是解读墨白小说的一把钥匙。这是墨白的成功，也是他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贡献。

孙方友四卷本的新笔记体小说集《小镇人物》，写的是“颍河镇”上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物：

“曹长老是江西人，随部队打仗来到颍河镇，最后寻了个镇上姑娘，便落下了户。”（《曹长老》）

“颍河镇土改的那一年是1947年。那年秋天，从周口来了一队身背背包、打着绑腿的男男女女。”（《于宝兰》）

“有一年，颍河镇新调来一个书记，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新来的书记很相信老崔，一下把乡下的招待任务交给了他。”（《崔班长》）

“马五的祖爷爷被杀死后，他的奶奶被迫走投无路，便带着马五的太爷爷逃到颍河镇，嫁给了一个姓马的挑夫。”（《马五》）

杨文臣博士说，孙方友“用平实朴素、笔简意丰的语言，去直接呈现小镇居民的生存状态，并将复杂的人生况味蕴藉其中”。此为至论，孙方友正是通过塑造“颍河镇”的人物形象，来呈现“颍河镇”居民的生存状态、打捞人性的美好，并试图重建民族的文化精神，堪称新时期小镇生活的浮世绘。

就如英国作家哈代最重要的小说都以威塞克斯农村为背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绝大部分小说都以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鲁迅笔下人物活动的舞台大多是鲁镇，莫言的很多小说故事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一样，李乃庆也以新站镇作为原型，在其小说文本中建构了一个小镇——“颍河镇”，并反复书写，借以表达他的“乡土情结”。例如：

“颍河镇紧邻颍河，地处三县交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从镇东到镇西光码头就有三四座。”（《土屋》）

“颍河镇是一个古老的集镇，因紧靠颍河而得名，东西狭长。主街是东西大街，离河岸只有七八十米。”（《二月二，龙抬头》）

这样，“颍河镇”就成了李乃庆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意象，象征的是一种古朴而略显沉滞的生存景观。

受墨白、孙方友、李乃庆等作家的影响，青年作家红鸟的小小说也多次写到“颍河镇”，比如：

“要我说，我们颍河镇最漂亮的女人还是薄荷。”（《冰雪美人》）

“阿吉是我们颍河镇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名字是她母亲起的，图吉利的意思。”（《阿吉》）

“有一年，淮河发大水，我们颍河镇来了很多逃荒要饭的，当时都住在早已废弃的电影院里。”（《十八件毛衣》）

在小说艺术运思、建构自然与社会环境时，红鸟显然对故乡前辈作家进行了“模仿”。红鸟“模仿”故乡前辈作家创设的“颍河镇”，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深刻地表达了成长的主题。成长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惊心动魄，包括身体上的成长、精神上的成长等诸多层面，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都比较大，所以，成长主题的作品往往以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呈现。比如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中国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邱华栋的《夏天的禁忌》等，都是堪称经典的成长主题长篇小说。而红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以小小说的形式表现成长的主题，而且写得颇为精彩。例如，红鸟的小小说《冰雪美人》，叙述少年的“我”对颍河镇漂亮女人“薄荷”隐秘而懵懂的恋爱。《冰雪美人》与《一件小事》《油菜花飘香的季节》等小小说，是红鸟的“少年心事”系列作品，樊义红博士说：“大抵而言，‘少年心事’系列可以归入‘成长小说’一类，大都取材于作者对少年生活的追忆，特别是那些在过往的岁月中留下深刻印痕的记忆。正是这样一些记忆让人体会到生活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催化剂’，让我们告别年少的天真烂漫，走向成熟而复杂的成人世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在其获奖长篇小说《生命册》里，也写了“颍河镇”：“在颍河镇，梁五方作为一个‘专业上访户’，是极为出名的。”“女书记说：这样，跟颍河镇打个招呼，把他送福利院。给他个养老的地方。”……当然，正如名叫“新站镇”的，有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的新站镇、吉林省蛟河市的新站镇、贵州省桐梓县的新站镇、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新站镇等诸多不同地方，许昌作家李佩甫笔下的“颍河镇”和周口作家笔下的“颍河镇”，大概也属于不同的地方吧。不过，李佩甫毕竟也是喝颍河水长大的，其担任编剧的电视剧《颍河故事》曾经风靡一时，他对颍河毫无疑问一往情深，所以才有其作品中关于“颍河镇”的艺术建构和用心书写。



周口市淮阳区新站镇。

刘亦晨 摄

本版统筹审读:董雪丹

## 文化溯源

## 让陈胜找到回家的路

曾威

秦汉的风，掠过两千年尘烟，仍在为一个名字吟唱——陈胜。这位中国历史上首位农民起义领袖，以九百戍卒的孤勇撞碎暴秦铁幕，用“张楚”政权的篝火，照亮了布衣抗争的漫漫长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至今仍在华夏大地回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慨叹，藏尽了寒门英雄的凌云肝胆。

刘邦登基后以王侯之礼祭祀他，无此首义星火，便无大汉四百年燎原基业；司马迁更在《史记》中为他立传“世家”，与诸侯并肩，敬其撼动历史的力量。

可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其故里“阳城”的具体所在，却成了萦绕史学界千年的谜题，周口商水、郑州登封、南阳方城、安徽怀远四地，各执一词，纷争不休。

四说之中，最经不起推敲的，是安徽怀远之论。此说仅凭《大明一统志》与清光绪《宿县志》的零星记载立论，而唐宋以前的权威古籍里，竟无半点此地设“阳城”的痕迹。怀远阳城始建于东晋，与陈胜所处的秦代相隔数百年光阴，至于当地的君王村、秦汉古银杏林，不过是英雄起义途中遗迹的留存，绝非故里的明证。排除这一虚妄之说，争议焦点便集中在河南境内的三处“阳城”。要 为英雄寻回故土，不妨循着权威典籍、起义路线、义军集团，以及考古发掘，逐一拨开历史迷雾。

司马迁的《史记》，是触摸这段历史最可靠的掌纹。太史公距陈胜起义不过90年，22岁便周游天下访古探幽，那些亲历秦末风云的老者口述，化作了书中翔实的记载。《史记·陈涉世家》开篇便锚定坐标：“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阳夏即今日周口太康，与商水唇齿相依，秦时同属楚地。乡音相通，水土相融，才让二人

在滴成队伍中结为生死战友，起义成功后定都陈郡（今周口淮阳）也顺理成章——这里有他们熟悉的乡邻、有扎根故土的人脉，更契合楚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执念，这是商水为陈胜故里的首要铁证。《陈涉世家》中还藏着一处关键伏笔：陈胜起义时，决意“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而今日商水县舒庄乡，恰好有扶苏村、扶苏墓（经考证为假冢）。若非故土，为何要在这与扶苏无甚关联之地为其修墓？答案藏在起义的智慧里：借扶苏之名立势，让反抗有了“师出有名”的根基，这是第二重铁证。更具说服力的，是《史记·李斯列传》中赵高诬陷李斯的供词：“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傍”即靠近，李斯故里是今驻马店上蔡，登封、方城与上蔡相隔千里，唯有商水与上蔡壤地相接。地缘关系的印证，让真相愈发清晰。此外，陈胜称王定都陈郡后，“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张楚政权仅存半年，秦军铁蹄未远，老乡们若要成群结队探望，必在方圆百里之内——商水距淮阳不足百里，这份乡邻的奔赴，便是最朴素的铁证。

陈胜的根，深植楚地。这是判定其故里的核心前提。起义时“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定都后“张楚”的国号，三老豪杰“复立楚国之社稷”的称颂，老乡相见时“夥颐”的楚地方言，乃至秦二世、赵高口中“楚戍卒”“楚盗”的贬称，字字句句都在昭示他的楚人身份。历史上名为“阳城”的县邑虽有九处，但唯有属楚之地，才可能是英雄的故土。考证可知，登封阳城先属郑，后属韩，从未入楚；南阳方城一带分属韩、魏，后被秦直接吞并，与楚无关。唯有商水阳城，自战国起便是楚国的固有疆土。《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晰标注，商

水一带战国时筑有阳城、郢郢、孰城三城，秦时设为阳城县，陈胜称王后扩建为扶苏城。相传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的记载，虽赋文或为伪托，但“阳城”与楚地下蔡并提，足见其楚国城邑的属性。公元前278年，楚迁都于陈近四十年，商水作为陈都腹地，直至楚国灭亡始终属楚。陈胜这位楚人的儿子，故里自然在此。

起义的路线，是一条指向故土的归途。公元前209年，九百戍卒的脚步从阳城出发，踏向通往渔阳的漫漫征途。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大雨阻断前路，失期当斩的绝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壮烈的起义。大泽乡是商水通往渔阳的必经之路，二百余里的直线距离，让这场遇阻合乎情理；若从方城出发，需绕道千里；从登封出发，更要先向东南背道而驰，皆违背常理与军事常识。起义爆发后，义军一路向西，如潮水般席卷宿县、永城、亳县、鹿邑，直抵陈郡。短短数月，九百人的队伍便扩充为“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的大军——这份迅猛壮大的底气，源于故土乡邻的响应。陈胜攻入陈郡后当即定都，不再迁徙，既未选登封腹地颍川，也未选兵家必争之地南阳，只因这里是楚都故地，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商水出发、大泽乡举义、陈郡定都，这条清晰的轨迹，如红线般牵出了英雄的故里。

义军的脉络，缠绕着故土的羁绊。中国旧式农民起义，从来离不开乡邻故旧的支撑，项羽靠吴中父老，刘邦靠沛沛集团，陈胜亦如此。他麾下 的核心将相，皆与陈郡及周边紧密相连：吴广是阳夏人，与商水比邻而居；张耳、陈余秦时亡命于陈；武臣、邵骚皆是陈地人，且为陈胜“故所善者”。秦代“举族连坐”的高压下，造反是诛九族的重罪，陈胜敢将